

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的背后

□ 尹传红



事业从零起步直抵星河深处。

2026年10月8日,中国航天70岁了。

70年前的这一天,中国导弹研究有了起点——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。中国航天后来那部大书,也正是从这张导弹“出生证”开始,翻开了第一页。

飞机还是导弹？一个逆流的判断

1956年春天,北京。刚刚回国的钱学森,正被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驱策着。他带回来的,除了几箱子笔记、一颗赤子之心,还有一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对“如何不再挨打”的焦灼叩问。

问题很具体:新中国底子这么薄,到底该先造飞机,还是先搞导弹?

1956年4月,一场关于“飞机与导弹轻重缓急”的讨论摆到桌面上。空军和工业部门的同志大多倾向“飞机派”——抗美援朝战场上,制空权的分量谁都掂得出;苏联援建的航空工厂里,初教-5已经上天,歼-5的试制也在推进,摸得着、看得见。而导弹呢?多数人连这个词都没听顺。外文资料里的 guided missile 不知怎么译,有人叫它“飞弹”,有人叫它“带引导的弹”,报纸上满纸“飞弹”,既不准确,也不顺口。众声嘈杂里,钱学森的判断却指向了另一条路:先搞导弹。

他不是不知晓飞机重要。他本是航空气动学科里走出来的人,太清楚飞机背后那道高墙意味着什么——要载人、要重复使用、要材料、要发动机、要几十年经验积累。他的判断恰恰从这道墙开始——越是载人的、越要万无一失的,越需要长周期工业底盘;而百废待兴的新中国,最等不起的恰恰是时间。

这是第一层:国情之判。飞机难在材料与寿命,导弹难在制导;制导能在短期内突破,材料却急不来。钱学森跟人比划:弹体加发动机不过占总工作量两成,自动控制要占八成。德国V-2火箭为什么老砸在伦敦城外?不是推力不行,是像没头苍蝇般乱撞——自动控制系统没过关。

第二层是战略之判。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,是如何不挨打;其次,才是如何还击。导弹比飞机快,10倍音速对3倍音速;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,飞机追击导弹却难以还手。苏联米格-15战斗机作战半径300公里,跨不过三八线;而导弹可以从本土指向远方。在资源有限时,“四面出击”太奢侈,“集中突破”最清醒。

第三层,是时间深处才能看清的远见之判。导弹和核武器,终归要结合。钱学森敏锐地注意到高层正在筹划原子弹,他明白,原子弹没有导弹,不过是炸在自己院子里的惊雷;导弹没有核弹头,也不过是跑得快的弹体。只

有“两弹结合”,才有战略威慑。他说得沉静而笃定:我们不走美国的路,也不走苏联的路,要走自己的路,迎头赶上!

宴席上“一拐”与铅笔的“一勾”

有意思的是,连“导弹”这个名字,都是钱学森顺手定下的。后来,中国辞典里就有了这样一条释义:导弹——依靠自身发动机喷射工质产生反作用推进、能控制其飞行弹道、将弹头导向并毁伤目标的武器。

在一次演讲中,钱学森说:炮弹、枪弹都会飞,单叫“飞弹”,显不出它的特别;它在飞的时候是受控制、可制导的,叫“导弹”才合适。“导弹”二字,说透了其本质——看的不是“飞不飞”,而是“听不听使唤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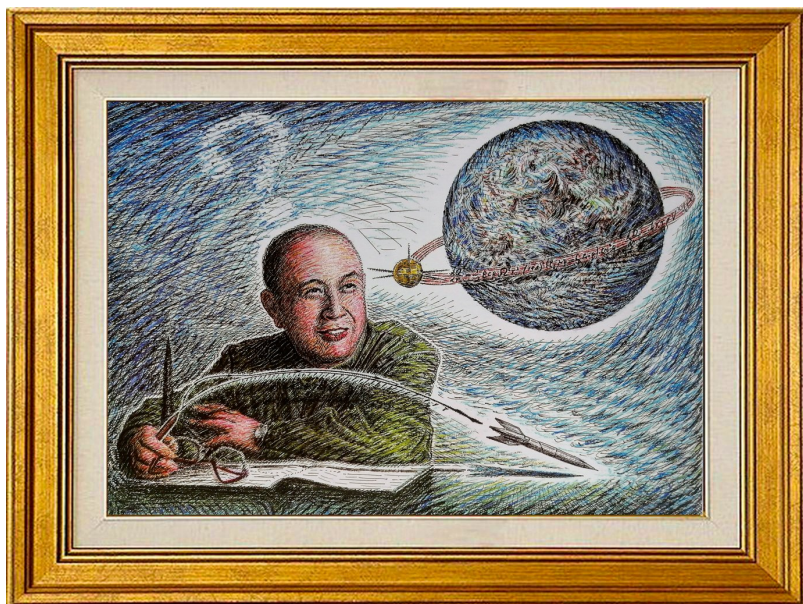
决策过程中有些细节,至今令人感慨。1955年冬,“哈军工”对外是严格保密的,钱学森提出到学院看望老朋友,请求层层上报,最后由中央批准。陈赓大将专程从北京飞哈尔滨迎他,宴席上装作请教火箭,话题忽然一拐,向钱学森提出了那个“使命性”的问题:“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?”钱学森憋着一股劲儿,回道:“外国人能搞的,中国人就不能搞?”陈赓一拍桌子:“就要你这句话!”

躺在医院里的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等不及,催来钱学森,问他“造得出打三五百公里的短程导弹不”?闻言“五年差不多”,老师眼睛亮了。1956年2月1日,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,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宴会上,用铅笔把钱学森的名字从37桌勾到主桌旁边——那是“五个师”都换不来的信任。

1956年5月26日,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军委会议,讨论聂荣臻元帅综合钱学森意见提出的《关于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》,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了发展导弹武器的决定。方针极有分量,字字千钧:先突破一点,不能等一切条件都齐了再动手。这十几个字,是策略,也是哲学:条件永远在前面跑,等,就输给了时间。同年10月8日,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挂牌,钱学森任院长,中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由此起步。

第一块骨牌推倒之后

后来发生的事,像推倒第一块骨牌后,整副牌阵次第传递。导弹要飞得准,必须得有自动控制、有计算机、有新材料、有发射场;这些能力外溢出去,就成了火箭和卫星,陆续就有了“东方红”、有了“神舟”、有了“嫦娥”、有了“天



钱学森与中国航天。刘夕庆 绘

宫”。当年那枚“一次性的、不载人的”武器——新中国第一款战略级兵器,悄悄长出了中国航天的全身骨骼。

最能体现钱学森科学方法与战略思维的,是后来“八年四弹”技术路线的确定。1963年,他组织制定规划,推动在1965年至1972年间研制中近程、中程、中远程、远程四种导弹。先搞哪一种?有人主张由近及远、一级一级往上堆。钱学森却看得更深:集中力量攻远程,把最吃紧的制导、材料、发动机问题一次性逼出来,其他型号就有了可放大的底座。若按部就班从近程搞起,等技术一层层自然成熟,战略窗口恐怕早就关了。

中国导弹与航天技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任新民后来回忆说,关键技术在前面打通了,后面型号研制就顺了——一个好的战略决策,从来不是“哪个先做”,而是“哪个做了能带动一片”。

后来的东风-4、东风-5走通了这条路。1980年5月18日,东风-5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全程飞行试验成功。待到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的紧要关口,钱学森只写了十个字:“应将飞船方案也报中央。”他还是那样从容:不赶潮头,不凑热闹,把最关键的那一步想定,便托了后来一切的底。

今天,再看1956年那场摆到桌面上的争论,“飞机派”和“导弹派”走的实则是同一条路,只是脚步先后而已。飞机从未偏废,歼-6、歼-7、歼-8一直在飞;但若当年不分出轻重、不把导弹这把尖刀先磨出来,中国未必能那么快撑起“两弹一星”的战略屏障,也未必有底气在后来让航天从“为国铸剑”走向“化剑为犁”。

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定,从来不是兴之所至、水到渠成。正因当年把该算的都算透了,把该想的都想远了,70年来“导”与“弹”才从未分开——导是理性照路,弹是决心作答。那个春天的一声“点火”,至今仍在每一枚升空的火箭尾焰里灼灼生光,响彻苍穹。